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当代中国史研究

(第2辑 · 2012)

朱佳木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当代中国史研究

(第2辑 · 2012)

朱佳木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辑·2012)/朱佳木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ISBN 978-7-5161-1952-5

I. ①当…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文集
IV. ①K2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3244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408千字
定 价 6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编委会

主 编 朱佳木

编委会 于 沛 田居俭 齐德学 李 捷
张启华 张海鹏 张星星 沙健孙
武 力 金冲及 梁 柱 程中原
逢先知 董志凯

前 言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重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并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2009年年初决定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后，一方面注重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织机构的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的研究室和中心等；另一方面又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决定从2011年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每年收录年内全国范围内相关学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
2011年9月

目 录

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形态理论	王伟光 (1)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验应当注意的几个方法问题	朱佳木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新发展	李 捷 (24)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长期性和阶段性认识的深化	有 林 (41)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之际	欧阳淞 (53)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逢先知 (63)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沙健孙 (70)
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	张启华 (79)
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建设三题	陈 晋 (88)
在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变迁中成就历史伟业	
——论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作用	柳建辉 (94)
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伟大探索	武 力 (104)
指引小农经济通向现代化的灯塔	
——中国共产党农民合作经济的四大理论成果	郑有贵 (117)
中国共产党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与经验	姚 力 (134)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中流砥柱	
——兼评近年否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几种错误观点	李方祥 (146)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 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李慎明 (163)
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创举	田居俭 (201)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条判断标准论的重要意义	卫兴华 (211)
1956 年陈云代理总理期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实践与经验	孙翠萍 (219)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启示	董志凯 (230)
中央人民政府直辖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问题研究	宋月红 (240)
对 1960 年人口减少一千万的质疑	许全兴 (255)
“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与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	程中原 (262)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基本 经验总结	李 文 (273)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与历史研究的理论 和方法	陈东林 (284)
新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李正华 (293)
用 GDP 评价新中国头 30 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	李 强 (305)
中国当代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	刘国新 (321)
论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刘 仓 (331)
新编地方志与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王 胜 (345)
从“零和对抗”到“合作共赢” ——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历史演进	刘永路 徐绿山 (353)
中尼边界谈判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齐鹏飞 (368)
后记	(382)

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王伟光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唯物史观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收获的重要理论硕果。

马克思虽然没有就社会形态问题撰写过专著，但一生中围绕着这一问题留下了大量论述。马克思最早提出“社会形态”（Gesellschaft formation）的概念，是在1851年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写道：“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①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根据日本学者大野节夫的考证，形态（Formation）这一语词是马克思从当时的地质学术语中借用过来的。该词在当时的地质学中用以表示在地壳的历史中先后形成的不同岩层，一个形态就是一个不同的岩层单位。可以看出，马克思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意在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不同的历史层次、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样态构成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586页。

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达，并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②通观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诸多论述，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最核心、最根本的要旨就在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是囿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致，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演进，资本主义社会同其前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只是人类社会历经的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兴盛走向灭亡，人类社会形态必将驶入一个全新的进程。

岁月更替，人世沧桑，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相反，它依然以其宏大的世界视野、科学的理论价值，对当今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南作用。必须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原则与时代特征、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获得时代的升华。

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为我们研究、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自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暂时的低潮，世界格局呈现出西强我弱的态势。与此相适应，一些抱有政治倾向的西方学者则在“别无选择”的喧嚣声浪中抛出“冲突”与“终结”等各色话语，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最终止步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却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显示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变化，一超多极的格局虽未根本改变，但美国的霸权已日渐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平发展的力量正在逐步壮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正在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成功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笔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一文中曾谈道，“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危机伴随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曾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从长期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结局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这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负面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和持续的破坏性影响，世界局势乃至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进程和历史也将会发生重大转折”。这一历史形势，将愈益激发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再探索、再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再研究、再发展。

当代中国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奇迹，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提供了绝好的实践场域与理论舞台，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与理论概括，必然形成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今天，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瞻性、预见性和指导性，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阔步迈进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本身，也需要结合新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实际，不断进行科学的概括、总结和创新，将其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当时其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后来的实践发展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进一步修订和发展了原先的看法，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对东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今天，围绕从理论与实践上深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最重大的时代课题，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和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深认识：第一，马克思

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承认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探索。既要考虑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又一定要从本国的特殊发展规律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充分估计具体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道路具体多样性的科学预测。这就告诉我们，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也应当是多样化的，而不能只是一个模式，仅一条道路，一定要在遵从历史发展总体规律的前提下，从历史多样性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是在肯定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前提下，注意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历史的选择作用。从中可以认识到，既要坚持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坚持历史决定论，又要承认人的历史主体能动性，从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四，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审慎的科学设想，只是一种现实可能性的分析，尚需经过社会实践的验证。这表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随着不断的实践的检验，对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才能越搞越清楚，才能不断深化。

如何科学地辩证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笔者的看法是：理论在概括事物本质时，剔除了大量偶然的因素，舍去了活生生的事例，只是对历史发展客观逻辑的一种抽象，并不是对全部社会现象的总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讲的只是一种总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总的历史规律，并不等于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必须完整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完整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的前后递进，也是如此，并不等于否定历史的跨越，也不等于否定历史可能出现的倒退。从学术的角度看，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概括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也要看到，理论概括源于实际，但并不等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实际。“五形态”说只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具体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直线

的、绝对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地区是否可以有特例、有偶然的情况发生，是否都要依次经过同样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它绝对化。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以认识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为满足，而是努力进一步探索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般地说，像英国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但他们又预言，像俄国那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原理时，并不排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依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采取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不排除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归根结底，这一切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这种运动所决定和表现出来的历史环境，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主体能动性。这个重要思想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它告诉我们：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一定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特殊性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不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一般规律理论的否定，而是对该理论的深化和丰富。

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沉痛教训，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绝不能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得出的现成结论，从本本出发，是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也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本质。

党的十七大报告有一个总结性的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具体形态和特殊规律的大胆探索中，科学社会主义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人民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引领旗帜。可以说凡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成果，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

题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如一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经验和道路的理论总结与学术建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希望所在。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验 应当注意的几个方法问题

朱佳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通过 30 周年。这两个纪念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科学总结了新中国 32 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开启了国史研究的进程，并为国史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方向。作为国史研究者，对这两个纪念日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沿着《历史决议》指明的方向，深入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内容的新中国历史，特别是加强对这一历史的经验研究。

研究历史经验从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史学宗旨的具体体现。司马迁说过，他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换成今天的话讲，就是要揭示历史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安邦治国的一家之言。朱熹则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②意思也是讲，研究历史不要纠缠一些琐碎事件，而应关注重大事件，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总结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党。毛泽东早

① 《汉书》卷 62《司马迁传·报任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35 页。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11《学五·读书法下》，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96 页。

就指出：“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①“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②邓小平在制定《历史决议》时也指出：“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③江泽民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谈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问题时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④胡锦涛总书记在21世纪初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⑤他们的论述说明，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改革开放的事业的成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分支学科，也是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史研究者研究国史，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重在研究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又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当然，国史研究者研究历史经验属于学术范畴，与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总结历史经验之间不完全一样。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总结历史经验，一般要从当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④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25页。

⑤ 胡锦涛：《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第1版。

前面临的全局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入手，总结出的经验也往往会直接用于制定政策、指导工作和教育干部群众。国史研究者虽然也要关注具有全局性和紧迫性的问题，但一般会把研究的视野放得更宽；研究成果一般也不会直接用于制定政策，而是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制定政策提供历史依据，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参考，就是人们常说的“资政育人”。然而，无论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还是国史研究者，总结和研究历史经验，都要站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这些方面是没有也不应当有什么区别的。即使在研究的基本方法上，二者大体上也应当是相同或相似的。

下面，谈谈国史研究者在研究国史经验时应当注意掌握的几个基本方法。

第一，既要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又要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联系起来研究。

新中国成立距今已有 61 年历史，其间根据社会历史条件和党的工作重点等的变化，可以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例如，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 29 年和改革开放后的 32 年。在改革开放前的 29 年里，又可以分为 1949—1956 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7 年和 1957—1978 年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 22 年。在改革开放后的 32 年里，大体也可分为 1978—1992 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14 年和 1992—2003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11 年，以及 2003 年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 8 年。这些不同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研究历史经验时需要把它们分为不同时期来研究。例如，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宏观指导作用，在土地承包到户的条件下如何发挥集体经济作用、解决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情况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如何保护农业用地，在推进互联网发展的同时如何加强对它的监管，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条件下如何防止党脱离群众、端正干部作风等经验，就不大适合笼统地放在 61 年中研究，而应当主要放在后 32 年里加以研究。因为，这些问题在前 29 年基本没有产生的条件，因而也不可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

然而，新中国 61 年的历史无论划分多少阶段，基本国情都没有根本

性的改变。除最初的7年外，它们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点都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资源缺，主要矛盾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各个阶段虽然有各自的特殊性问题，有的差别还非常大，但都存在不少共性问题。例如，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好，如何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实际，如何使国民经济既快速又协调稳定地向前发展，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建设的关系，如何回应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的诉求、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如何保证党不脱离群众、永远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等。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前29年里有，后32年里也有。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就需要把61年里各个阶段的历史联系起来，并通过比较加以考察。这样研究，才会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使研究更加深入。

以“急于求成”为例。这在新中国历史中可以说是带有一定顽固性的问题。如果把改革开放前后大体划分为两个30年的话，应当说它的表现程度和后果在这两个30年里是不一样的：前30年发生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损失程度重；而后30年一般来说，范围比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损失也没那么大。但是，只要把两个30年中“急于求成”的问题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确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把建设速度搞得快一点，以便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把耽误的时间（无论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还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夺回来；而失误都在于把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混淆了，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而且，其中或多或少都有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怪。因此，我们在研究如何克服“急于求成”问题的历史经验时，需要重点研究如何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正确，如何改进干部的考核、评价办法。这些问题不解决，“急于求成”的毛病今后还会反复出现。

再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为例。这种变革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里也都存在，只不过前30年往往把变革称为“革命”，如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企业里的管理制度革命，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直至后来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且不说这些“革命”的方向是否都正确，是否都合乎客观实际的要求，单就处理“不断革命”与“革命发展阶段”的关系，就有不少值得总结的教训。今天，